

威廉·赖希和安娜·弗洛伊德：他如何被精神分析协会驱逐

本文发表于《国际精神分析论坛 International Forum of Psychoanalysis》杂志的《强权政治与精神分析》专题。作者为洛尔·赖希·鲁宾 (Lore Reich Rubin, 原姓赖希), 她是威廉·赖希 (Wilhelm Reich) 和安妮·赖希 (Annie Reich) 的小女儿。1938 年, 安妮·赖希与第二任丈夫托马斯·鲁宾斯坦 (Thomas Rubinstein) 以及他们的女儿伊娃 (Eva) 和洛尔移民到美国, 安妮·赖希是精神分析学家奥托·费尼切 (Otto Fenichel) 周围圈子里非常著名的左翼反对派活动家。在学习期间, 洛尔加入了共产主义组织美国民主青年 (American Youth for Democracy, AYD), 这是一个校园和社区组织, 1949 年被列入美国禁止组织名单。1957 年, 她开始接受精神分析师培训。毕业后, 她专注于创伤研究。

精神分析从来不是对等的。精神分析师对受分析的病人来说占有隐性权力支配和思维操控-暗示、权威真理^[1]的地位, 在殖民地地区, 作为白人意识形态输出工具的这种霸权和压制作用更为明显, 而且精神分析当然可以被有意图的人逆向工程——70 年代阿根廷法西斯军方在解散左翼的精神病学联合会 FAP 之后挪用和重构了以社区为基础的精神病学观点, 将左派的颠覆行为病理化, 并推进其自身的保守意识形态。

但是鲜为人知的是, 赖希在十月革命后由于投入马克思主义而在早期精神分析派别内部广受排挤, 持续受到来自弗洛伊德家族核心圈和维也纳分析师阶层的各种手段报复, 最终开除出国际精神分析协会 IPA。同时, 虽然身为体面的、有学识的“精神分析学家”, 弗洛伊德们仍然使用着最刻板古老的诅咒方式: 指控赖希是疯子, 是违反了维也纳文明圈子的癫狂偏执患者, 通过对儿童和协会会员广阔的控制网络——包括躲避纳粹而移居扩张到美国的学术界, 牢牢把赖希压在枷锁之下。

作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Sigmund Freud) 的女儿和事业接班人, 安娜·弗洛伊德 (Anna Freud) 与俄国精神分析师莎乐美 (Lou Andreas-Salome) 有深厚的友谊, 与美国儿童精神分析学家多萝西·伯林厄姆 (Dorothy Burlingham) 成为了终生伴侣和合作者。精神分析史学家伊丽莎白·鲁迪内斯科

(Élisabeth Roudinesco) 认为, 正是对自己同性恋性欲的压抑影响了安娜, 使她在临床工作中将同性恋病理化, 并大力倡导国际精神分析协会禁止同性恋者接受精神分析师培训的政策。实际上这可能是一种误读, 安娜·弗洛伊德或许不是异性恋也不是传统意义的同性恋者。安娜在与父亲弗洛伊德的关系中是一个忠诚的婴儿, 是依赖性很强的幼女, 而在和多萝西的交往以及帮助多萝西照顾孩子——安娜的第一个儿童精神分析对象就是多萝西的孩子——的过程中, 安娜成为一个还原母性的母亲-女人, 她也和多萝西分享病例从而成为一个分析学的大师和独立思考的个体, 这就是自我防御机制的运作 *The Ego and the Mechanisms of Defense*。但是这种机制导致安娜对于病人与儿童有着违反医疗分析原则的强烈的排外控制心理, 而这将导致政治环境恶化后坚持保守主义的她对赖希的反移情和诡计。

这篇论文讲述了 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威廉·赖希和安娜·弗洛伊德在当时主要意识形态和政治趋势及事件的背景下的斗争历史。这场斗争将从政治角度和个性障碍的角度进行描述。最终, 赖希被国际精神分析学会 (IPA) 开除了会籍。我从两个角度来撰写这篇论文。第一, 作为一位精神分析师, 我试图解读现有的领域文件。第二, 更具个人性质, 威廉·赖希是我的父亲。

近年来, 随着一些人的去世, 无法再推动审查制度, 很多历史事件通过信件和传记逐渐被公之于众。例如, 关于安娜·弗洛伊德已经出版了两本书, 我将它们作为了解安娜个性和性格的主要来源。其中一本是伊丽莎白·杨·布鲁尔 (Elizabeth Young-Bruehl) 的传记^[2], 另一本是迈克尔·伯林厄姆 (Michael Burlingham) 的《最后的蒂凡尼》^[3] (*The Last Tiffany*)。迈克尔·伯林厄姆的祖母是多萝西·伯林厄姆 (Dorothy Burlingham), 她是安娜·弗洛伊德的终身伴侣。

在过去的一年里, 维也纳和巴塞尔出版了一些关于赖希的新书: 卡尔·法伦德 (Karl Fallend) 的《维也纳的威廉·赖希》^[4], 法伦德和尼奇克 (Nitzschke) 共同编辑的《威廉·赖希案》^[5], 以及斯特罗姆菲尔德出版社出版的费尼切 (Fenichel) 通讯集 *Rundbriefe* ^[6]。《Rundbriefe》是费尼切与一些分析师在

1934年至1944年期间的十年通信。这些信件通过我母亲的手传给了我。尽管受到压力，我将这些信件交给了一个出版商，而不是埋藏在国会图书馆弗洛伊德档案中。关于赖希的个人信息来自我与母亲和家人的交谈。

现在我将给你介绍一下我的父亲。他并不是一个圣人，他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人，但在这个生日庆祝的场合，我不打算过多强调这一点。我对此感兴趣的是，在这里有一个热情洋溢、精力充沛、致力于精神分析的人。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从军队退役，仍在维也纳的医学院学习时就开始接触精神分析。赖希最终成为了维也纳精神分析诊所的负责人。他还在1924年至1930年间在维也纳精神分析学院教授技术研讨班。根据本文中引用的资料，他受到精神分析界的广泛尊重并有许多朋友（3:45）[7]。理查德·斯特巴（Richard Sterba）[8]将这个对赖希非常重要的群体描述为非常密切的群体，成员之间关系紧密，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到精神分析界的年轻人经常在群体内部结婚。我父母也是如此，他们都成为了精神分析师。

然而，赖希与他的第二位分析师保罗·费德恩（Paul Federn）发生了争执。现在我们对移情 *transference* 和反移情 *counter-transference* 非常感兴趣。尽管当时对于移情已经有所了解，但对于反移情几乎一无所知。我相信，费德恩对我的父亲产生了强烈的反移情，并无视有关谈论自己患者的保密规则。相反，他花了多年时间试图说服弗洛伊德摆脱赖希，让他离开技术研讨班，离开诊所（3:195–202）。我父亲向弗洛伊德抱怨这种迫害。费德恩没有意识到其中存在任何反移情，他认为赖希疯了，想要摆脱他。值得注意的是，弗洛伊德在大约1930年之前并没有听取费德恩的意见（4:250），直到其他声音，尤其是安娜·弗洛伊德的声音，开始反对赖希。

我的父亲对费德恩的迫害作出了有趣的反应。首先，我认为他对此感到相当沮丧，尽管这一点没有写在任何地方。我从母亲关于1927年我父亲陷入重度抑郁和严重肺结核的言论中推断出来的。

其次，在从达沃斯山区疗养院返回后，他提出了一个非常聪明、出色的新技术创新。这与发现患者的负性移情 *negative transference* 有关。我觉得他决定教他的分析师费德恩如何进行分析，不知道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然后，赖希写了《性格分析》[9]这本书。大约前100页讲述了负性移情以及在分析他人之前必须理解这一点。这个理论现在并不那么惊人。精神分析已经深入研究了移情和反移情，这个思想是相当现代的。但在当时，反移情的概念是相当革命且不被精神分析师接受的。

赖希有一种非常有创造力的方式来处理他所遭受的创伤。他在变得沮丧后总是能找到一个新的理论结论，这在他的一生中都是模式。同时，他的另一种恢复性防御机制也逐渐形成：如果被排斥在一个群体之外，他会建立一个新的群体并交新朋友。在赖希的一生中，他在面对挫折时提出了许多新理论，并组建了新的团体。但是我现在还没有讲到这个故事的那个部分。

尽管费德恩未能成功将赖希与弗洛伊德或精神分析界疏远，但安娜·弗洛伊德却成功了，我将在下文中讲述。当赖希失去了精神分析群体的支持时，他越来越多地与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接触（3）。然后，在被排斥出精神分析群体后，他于1930年离开维也纳前往柏林，为自己建立了一个新的社区和支持系统。（必须提到的是，到1934年，赖希已经被共产党开除，并且后来成为强硬的反共主义者。）

他于1930年离开维也纳，前往柏林。随着他变得越来越激进，他表面上的原因是他要去德国与纳粹作斗争。然而，维也纳也正在变得越来越法西斯化，他在那里潜在地面临危险。这可能是他搬迁的动机之一，但他也被排挤出精神分析团体（内部团体）。这是一个更加个人和痛苦的搬迁动机。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他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共产主义者。与此同时，维也纳的许多同事非常保守，尽管并非所有人都是如此。一些精神分析师非常左倾和激进。然而，弗洛伊德家族，包括安娜和西格蒙德，非常保守。这是艰难的时期，因此赖希的激进主义显得特别突出。弗洛伊德家族非常不安。他们认为精神分析会被公众与共产主义混淆。

不过，我必须告诉你，我实际上不知道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是否还在亲自从事什么工作。他的癌症在1923年被诊断出来。安娜·弗洛伊德越来越多地接管了精神分析组织的运营。1932年，我父亲想发表一篇关于受虐倾向性格的论文。弗洛伊德坚决拒绝发表，因为他认为那是一篇共产主义论文。然而，弗洛伊德受到了压力（4:35），最终他同意发表这篇论文，但要求期刊包括一篇驳斥文章，称它是一篇共产主义论文。正是由于压力来自恩斯特·克里斯（Ernst Kris）和西格弗里德·伯恩菲尔德（Siegfried Bernfeld）

等人，这篇论文才在《国际精神分析杂志》上发表（8:208, 3:166）。现在它已经重新出版在《性格分析》中。我最近在那里阅读了它，这是一篇关于受虐倾向性格的完全不错的论文。

赖希所做的是攻击死亡冲动/死本能，这是弗洛伊德当时发展起来的一个理论。当然，共产主义认为不能有死亡冲动，因为人们的问题都是由社会造成的。因此，弗洛伊德认为我父亲对死亡冲动的攻击是从共产主义的角度来的。当然，现在很少有理论家相信死亡冲动，而且即使他们相信，也已经从弗洛伊德悲观的观点上进行了相当大的改变。

赖希的论文是一篇非常好的精神分析论文。但值得注意的是，赖希公开反对了弗洛伊德的某个理论。这与精神分析师们的做法不同。他们倾向于崇拜弗洛伊德，如果他们与他有分歧，他们会在以后的论文中巧妙地改变观点，同时将自己的观点归功于弗洛伊德。毫无疑问，在1932年，我父亲已不再被弗洛伊德家族喜欢，并且他知道这一点；因此，他不再隐瞒与他们的分歧。

到了1933年，已经出版了一些来信[10]，安娜·弗洛伊德写信给英国的厄内斯特·琼斯（Ernest Jones），称她父亲弗洛伊德没有时间进行讨论，他只想摆脱威廉·赖希（9:59）。我不知道，正如我所说的，这是安娜的观点还是来自弗洛伊德本人。但安娜与厄内斯特·琼斯之间的通信毫无疑问表明，安娜密谋要摆脱赖希，并逐渐说服琼斯这样做是正确的。她特别愤怒的是，赖希在1933年离开德国后来到维也纳并发表了一次激进的讲话。她认为这会危及精神分析运动（4:68）。安娜的观点是，不应该将政治与精神分析混为一谈（9:59）。琼斯起初为人们拥有政治观点的权利辩护，但逐渐接受了安娜的观点。在与赖希亲自见面后，琼斯喜欢上了他，并在坚定立场时动摇了自己的决心，此时安娜通过对赖希妻子（也就是我母亲）的分析揭露出了一些事情，激励他继续行动（9:60）。琼斯随后开始针对赖希展开积极的运动。他写信给丹麦政府（9:59），后来又写信给荷兰政府（9:71）警告他们关于赖希的情况，并且他和弗洛伊德还致信德国精神分析协会，要求将赖希取消会籍（9:71）。弗洛伊德家族和琼斯的担心是精神分析将被认为与共产主义相联系。琼斯在与自己的英国公民自由良心作斗争后，建议精神分析师不应该积极参与政治。

毫无疑问，安娜或者西格蒙德也与马克斯·艾廷贡（Max Eitingon）保持联系。1933年，就在希特勒上台后不久，艾廷贡（4:69），当时负责柏林学院，写信给赖希让他远离学院，因为他们不希望赖希在校园被逮捕。

艾廷贡把这个消息传达给了赖希，出于礼貌，赖希辞去了柏林学院的职务。需要指出的是，当赖希在1930年离开维也纳时，安娜告诉他他不能同时成为柏林和维也纳精神分析协会的会员，并且在她的要求下，他之前已经辞去了维也纳的会籍。

关于赖希从德国精神分析协会自愿辞职的故事，大多数精神分析师都相信，我在本文的原始版本中也接受了这个说法，但事实证明完全不正确。重新阅读费尼切尔的通报（5:VIII）后（我最初是在打字机打印的单行间隙的洋葱皮纸上阅读的），可以清楚地看到赖希并不知道他被从会员名单中删除了。他是在1934年参加大会时阅读国际精神分析协会的小册子时才发现了这一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转向安娜·弗洛伊德寻求帮助，认为这是穆勒-布朗施韦格（Muüller-Braunschweig）在他自己的责任下完成的事情（后者替代了艾廷贡）。有关赖希被德国精神分析协会排除在外，然后没有被告知的故事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法伦德（3:224-25）。

在法伦德和尼奇克的描述（4:chapter2）中，您可以了解到德国分析师在纳粹统治下的遭遇。关于分析师是否与纳粹合作存在一些争议。尼奇克认为他们是合作的。为了正确评估整个事件，我确信厄内斯特·琼斯以及弗洛伊德家族都像当时的温斯顿·丘吉尔（1934年）一样，认为共产主义者比纳粹更加危险。

1934年，一次夏季国际精神分析大会在瑞士卢塞恩（Lucerne）举行。我父亲去了那里，毫无戒心地参加了会议。他当时住在丹麦，但即将被驱逐出境——琼斯在引发这次驱逐方面承担了多少责任尚不得而知。他来到这次大会上，发现自己已被德国精神分析学会的会员名单删除了。当时，安娜·弗洛伊德是执行委员会成员，琼斯是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的主席。他们告诉赖希，由于他不是柏林或任何其他当地组织的成员，他也不是国际学会的会员。章程规定他不能成为会员。所以他们以他不符合技术条件为由把他踢了出去，这个技术条件本来就是他们自己制定的。他们说，当然，如果他加入一个当地组织，他可以回来。但当时琼斯已经与所有的成员学会见过面，并让他们同意不接受赖希（5:VIII）。此外，斯堪的纳

维亚学会的申请被推迟，因为他们拒绝在接受时拒绝接纳赖希的条件。但是一两年后，当我父亲搬到挪威后，当挪威人申请成为本地组织的会员时，国际精神分析学会不允许新的挪威组织加入国际协会。因此赖希再也无法成为会员（5:VIII）。所以，这是经过策划的。首先，他们将他排除在他的本地附属学会之外；然后他们告诉他，由于他在政治上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死本能问题上的分歧，最好他不要再加入国际精神分析学会。他们说，赖希将这些思想结合成了一个性经济理论，而国际精神分析学会会被指责（5:VIII）。

阅读《Rundbriefe》可以清楚地看出，费尼切尔不知道安娜·弗洛伊德与琼斯密谋了这个情节。她能够完全隐藏在幕后，只是作为团体中的一员存在。这次驱逐的后果是我想要讲述的。那个夏天，我和父亲在一起。我们绕道方式去瑞士。我们从丹麦乘船去比利时，这样就绕过了德国。整个夏天我都和父亲在一起，他心情非常好，玩得很开心。但在被赶出国际精神分析学会之后，他变得非常暴躁。他完全愤怒，即使在孩子们在场时也与我母亲争吵。我相信他还与其他各种人争吵过。他真的非常沮丧。不过很快他通过使用上述有效的应对机制来恢复了。首先，他在挪威为自己组建了一个新团体，这个团体（在他们还活着的情况下）仍然对他充满了美好回忆。其次，他打破了精神分析对触碰身体的禁忌，并更多地发展成了“植物治疗”（后来演变为生物能量学）。

回到历史本身，重要的是支持赖希的精神分析家——费尼切尔以及柏林的一个整个团体和维也纳的很多人——感到受到威胁。他们无法说出任何话。他们害怕自己也会被赶出去。我认为这种危险是真实存在的。例如，费尼切尔在1936年仍然感到自己被当作一个失落的儿子回到大家庭中，并被他的维也纳同事告诉“现在你看到赖希疯了”（5:280）。例如，我母亲在1931年转到柏林时，神秘地被拒绝加入德国精神分析学会——在违抗安娜·弗洛伊德的意愿，重新与父亲团聚后。所以，感到无助的奥托·费尼切尔通过写作《Rundbriefe》来安慰和表达自己。当时还没有复印机，所以他会在打字机上用洋葱皮纸打13份副本，然后寄给所有左翼和马克思主义分析师的朋友们。这些信件非常机密。我母亲是《Rundbriefe》的收件人之一。多年以后，她临终时，一位同样收到过《Rundbriefe》的朋友进入她的衣柜偷走了它们，以免人们知道它们的存在或者知道谁收到过它们——他们害怕人们知道他们的马克思主义过去以及他们反对有组织的精神分析。然而，那名窃贼内疚并向我坦白，并用购物袋把《Rundbriefe》交给了我。这就是我们如何拯救这些文件的方式。当然还有其他的副本，但我有最完整的一套。

分析家中剩下的那些人发生了什么？左派真的很害怕他们也会被开除并保持低调，但他们有一个秘密的团结小组和《Rundbriefe》。其他的分析家们形成了一个保持沉默的阴谋。关于赖希被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开除的故事只出现在费尼切尔的《Rundbriefe》中。否则，没有人提到赖希发生了什么。

然后，历史开始被修正。欧内斯特·琼斯写了一本弗洛伊德的传记，在书中他说赖希“辞去了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的成员资格，赖希的政治立场导致了他个人和科学上的疏远”[\[11\]](#)（10：191）。但开除是由琼斯本人策划的！事实上，在被开除、被拒绝并被告知因为他的“性经济学”思想而不能成为会员之后，赖希生气地对琼斯说他将只是一名性经济学家。

然后，分析家们开始强调赖希“疯狂”，并声称这才是他被开除的真正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将某人贴上“疯狂”的标签在推出分析界时一直被使用，包括排斥兰克（Rank）、拉多（Rado）、陶斯克（Tausk），并且试图以同样的理由排除费伦茨基（Ferenczi）。事实上，在赖希被开除的同时，安娜·弗洛伊德正为摆脱拉多打下基础[\[12\]](#)（11：281-282）。

一些分析家非常幽默地传播着一个故事，这是维也纳式的幽默。他们说赖希来到卢塞恩，在大会前搭起了一顶帐篷，和他的情妇住在那里。他们还说他带着一把大刀。与此相比，真相显得如此平凡。赖希并没有在酒店前面，而是在露营地。那个女人不是他的情妇，而是他的妻子（我母亲正在办离婚手续，已经离开了他）。他没有钱，所以只能露营。露营时需要刀子。他们还指出他被开除后的脾气，以显示他是多么失控。他们从未将所有这些告诉他的孩子。我们不知道他在这次大会上为什么如此沮丧。似乎他突然发怒了。

多年来，一些分析家对我说过。他们带着一种有趣的表情，有些尴尬地说：“他真是一个伟大的人。他发生了什么？那太可悲了。”通常情况下，你不会走到某个人的孩子面前说：“你父亲疯了。”你不能这样做，这是不礼貌的。所以这背后有一种压力。他们必须这样做，这是强迫性的。我认为他们感到内疚，因为他们都在那次大会上。他们都知道发生了什么，却没有人谈论过。然后他们开始重新编写历史。

我只想提到几个例子。例如，斯特巴，他是我父亲的好朋友。有一些照片显示他们在一起滑雪，我想是在 1931 年，他们玩得很开心（7）。但他告诉迈伦·夏拉夫（Myron Sharaf）（6: 147），自 1927 年起他与威廉·赖希闹过矛盾。那么他在三十年代为什么还和他一起滑雪呢？斯特巴已经移民到底特律。50 年代他来到纽约发表一篇论文[13]。在这篇发表在《精神分析季刊》上的论文中，他批评《性格分析》这本书非常糟糕。斯特巴说，当阅读这本书时，你就能感觉到威廉·赖希已经是个偏执狂了。那么斯特巴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篇论文并不能进一步促进精神分析知识，但它会帮助他重新获得精神分析界的认可。因为他曾是赖希的朋友，所以他受到了怀疑。因此，为了与那些特别与安娜·弗洛伊德关系密切的移民分析家（尤其是在纽约）保持“关系”，他发表了这篇论文。

另一个改写历史的人是海伦·多伊奇（Helene Deutsch），她写了一本名为《与自己的对抗》的传记[14]，其中她对安娜·弗洛伊德颂扬了三页（13: 140-43）。这本书出版于 1973 年，据推测是在几年前写的。罗森（Roazen）在他对多伊奇传记第二版的引言中写道（11: vii-viii），安娜·弗洛伊德在多伊奇给罗森的书《兄弟动物 Brother Animal》提供支持后，对多伊奇施加了巨大压力。罗森说这使得多伊奇数年来与他断绝了所有联系。换句话说，多伊奇在与安娜·弗洛伊德发生严重纠纷仅仅一两年后，就写下了自己的自传。因此，在我看来，她自传中涉及安娜的部分是她试图重新获得内圈欢心的一部分。此时，安娜在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和美国精神分析协会尤其在东海岸有巨大的权力。

多伊奇与罗森和好了，多伊奇授权给他看她的信并撰写她的传记（11）。她与安娜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关系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画面。显然，在安娜建立的弗洛伊德晚年的圈子中，多伊奇与安娜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都有很大的麻烦。多伊奇明确表示，她 1933 年离开维也纳来到波士顿，并不仅仅是因为奥地利的政治局势，还因为她对安娜在弗洛伊德日渐衰落的岁月中建立的圈子感到不舒服。“对弗洛伊德的天才和年龄以及安娜甘愿追随父权意识所产生的效应，对于其他人来说，正在演变成为一种群体神经症”（11:288）。

但除此之外，多伊奇感觉需要改变关于赖希的历史。尽管多伊奇在精神分析领域拥有巨大声望，我认为她也感到与赖希的联系“被污染”，她必须重新建立自己。她吃惊地看着拉多被挤出内部圈子。在其他问题中，“安娜不同意于 1933 年拉多发表的纪念费伦茨基的文章中表达的温情”（11:281）。这意味着安娜不喜欢向“外面”的人友善，这会是她趋向于将你变成“外面”的人。多伊奇还表示了对赖希的积极看法。她参加了他的技术研讨会，而不是与安娜同时举行的研讨会。根据夏拉夫（6:152）的说法，她“享受并从赖希的维也纳技术研讨会中得到了很多收获”，尽管她认为他是“狂热者”。她甚至是前往美国后与赖希见面的为数不多的分析家之一。

但在她的自传中，她不仅非常批评赖希，这可能是她真正的感受，而且她写道，她自己启动了技术研讨会，目的是“贬低他在开放阶段专门处理消极移情的想法”（13:157-58）。但这是不准确的，不仅因为她曾说过她享受其中，而且因为研讨会始于 1924 年，而多伊奇当年在柏林。所以我认为，在回到安娜·弗洛伊德的内部群体中时，多伊奇感到有必要消除她五十多年前的不忠行为，强调她只参加了赖希的技术研讨会以贬低它。

我想提到的最后一个事件是，当夏拉夫和我被邀请参加 1986 年美国精神分析协会的一场关于精神分析历史的座谈会时，维也纳精神分析家的子女被要求谈论他们的父母。他们邀请了赖希、西格弗里德·伯恩菲尔德和恩斯特·克里斯的孩子们。在我进行简短发言时，我顺便提到罗伯特·瓦尔德（Robert Waelder）不愿意发表关于受虐倾向的赖希的论文。在座谈会的最后，来自费城的分析师古特马赫（Gutmacher），他现在已经去世了，是瓦尔德的学生，站起来说：“你没有遗漏什么吗？”我说，“什么？”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他说，“赖希疯了。这是你所忽略的。”我只有后来才意识到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抨击了瓦尔德不愿意发表关于受虐倾向的论文。古特马赫是瓦尔德的学生。当时我完全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当我回顾那个座谈会的录音带时，我惊讶地发现，在这个事件发生时，他们正在换磁带，所以没有记录。

那么为什么所有人都担心赖希呢？是什么氛围使他们保持沉默，修改历史，以与赖希划清界限？欧洲的巨大动荡是其中的一部分。纳粹掌权，人们被逮捕，共产主义者积极推动革命。因此，精神分析家们很害怕。但在这个精神分析社区中还发生了一些事情。正统主义时期始于 1911 年[15]，但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末和 30 年代，正统主义的问题与安娜·弗洛伊德有关，她正在被培养接管维也纳精神分析协会，然后

接管国际协会。她得到了弗洛伊德的帮助来巩固她的权力。但安娜也有一个人格障碍，她真的想成为第一名（1）。也就是说，安娜·弗洛伊德似乎是一个非常不显眼的人。没有人会预料到她是如此操纵和决心——对她来说，成为第一名并被所有人爱戴是如此重要。但事实是，如果你不与安娜·弗洛伊德合拢，你就是“外部”的人。例如斯特巴被排斥在外，但在维也纳所有“内部”的人中，都是她的好朋友。当她在1938年到达英国时，这种人格特质更加明显，包括欧内斯特·琼斯在内的所有人都这样认为。当安娜到达英国时，她发现她在儿童分析方面的理论和技术观点的主要竞争对手——梅拉妮·克莱因

（Melanie Klein）也在英国，且备受赞扬。安娜重新开始了同样的事情——你要么忠于她，要么你“不是分析家”。这就是她在维也纳微妙地做的事情。但现在她公开地这样做了。嗯，英国人更加忠于民主，他们不希望参与这种党派斗争。因此，一群人集结在梅拉妮·克莱因周围，安娜·弗洛伊德孤立汉普斯特德与一小群忠实的追随者在一起，但她真正的分析“内部”团体在美国。英国其他地方变成了“中间派”，因为他们不想成为这种党派斗争的一部分。

回到维也纳的情况，我必须说我的父亲也不是一个合群的人，他也一定要排第一，人格冲突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在于，他不理解安娜·弗洛伊德想成为第一的需求。就像我之前提到的，她看起来非常安静、低调。根据费尼切尔的说法，在维也纳研究所有一条走廊，在一头的教室里，安娜·弗洛伊德正在教授后来出版的《自我与防御机制》，而在另一头，赖希正在教授后来成为《性格分析》的课程。他们同时讲课，你不能同时听两个人的课。由于这两本书在性格结构理论上的方法差异很大，可以从回顾的角度看出，在维也纳已经存在一种对理论的党派斗争精神。这就是为什么出席我父亲研讨会的多伊奇在后来几年里不得不撤销对他的尊敬。在1950年代，这种理论派别主义的思想传播到了纽约。当我在纽约精神分析学会接受培训时，梅拉妮·克莱因只是个坏名声，她的理论没有被人们所读取，她被人们瞧不起，而安娜·弗洛伊德则被认为是大师。现在，梅拉妮·克莱因被赏识，并被视为当前客体关系理论的先驱，这与当前精神分析学的实践更接近。安娜·弗洛伊德则与自我心理学派被归为一类，她的工作并没有被广泛引用。

安娜·弗洛伊德也存在着隐藏的反移情，这导致她希望摆脱赖希。首先，在维也纳地区，安娜·弗洛伊德经常被戏称为铁娘子 Iron Maiden——一个中世纪折磨器具，由一个镂空的女性塑像组成，她用铁钉刺穿被放在里面的不幸受害者——有时候她也被称为铁处女 iron virgin。当赖希了解她的时候，她没有已知的性伴侣。有人认为后来多萝西·伯林厄姆成为她的情人，然而，也有人认为这不是一种性关系，尽管他们最终住在了一起。不管怎样，我们确切知道的是，她从未有过男性情人。在我父亲成为精神分析界成员的时候，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安娜·弗洛伊德都非常重视通过工作来升华性欲。你不必公开表达你的性欲，你可以通过升华来处理它（1:107）。例如，在《最后的蒂凡尼》中清楚地显示，多萝西·伯林厄姆渴望她的丈夫，渴望性生活。弗洛伊德家族努力让多萝西与她的丈夫分离，他们认为你可以努力工作，不需要性生活。弗洛伊德在罗伯特·伯林厄姆来采访他时说过这句话，安娜·弗洛伊德理论的重点完全是关于对本能的防御。因此，我相信，她个人感到被赖希攻击，因为赖希坚持认为，如果你没有完整的性高潮，你就有神经症，不完全的性高潮是神经症的源头，而这个女人从未有过性高潮。根据杨·布鲁尔的说法，安娜年轻时曾与自慰有过挣扎，所以弗洛伊德对她进行了分析（1:103-7）。换句话说，他实际上分析了自己的女儿的性生活！

此时，弗洛伊德已经非常禁欲主义了，四十岁那年，他的妻子在生了六个孩子后不再继续，他就放弃了性生活。因此，安娜和西格蒙德对性的看法都非常守旧。然而，弗洛伊德却改变了早年的兴趣。根据弗洛伊德写给弗利斯的新信件全集[16]（15:44），弗洛伊德刚结婚时，性生活出现了很多问题，他开始推测治疗神经衰弱的方法：唯一的选择就是年轻男性和未婚年轻女性之间自由的性交.....否则，选择只有自慰、神经衰弱.....梅毒.....在没有这样的解决方案的情况下，社会似乎注定要成为不可治愈的神经症的受害者。

所以弗洛伊德关于性与社会的原始思想更接近于我父亲对青少年性自由和通过解放民众的性生活来改变社会的宣传。然而赖希和弗洛伊德在自慰问题上并不一致，当弗洛伊德过了六十岁并且得了癌症时，他对性已不再那么感兴趣，我的父亲似乎太晚才开始心理分析。

彼得·赫勒（Peter Heller）谈到安娜·弗洛伊德于1930年度假在格隆德尔湖[17]（我也在格隆德尔湖度过了许多夏天，我对赫勒提到的日期是否正确并不确定），她住在湖的一端，而在另一端，年轻的分析师们在湖中央发生性行为并裸体沐日光浴，安娜对此非常不赞成。赫勒还谈到贝尔塔·伯恩斯坦（Berta

Bornstein) 在湖中间的船上发生性行为。因此，尽管他们是同龄人，但可以猜想这些年轻的分析师与安娜·弗洛伊德非常不同。

不幸的是，赖希正好在心理分析理论关于性的整体转变之际进入心理分析界，重点转向自我探索。对安娜来说，赖希的理论必定意味着她不正常。

安娜对赖希的反移情也与她与患者和儿童的复杂关系有关。一方面，施泰纳 (Steiner) 很好地证明了她的母性奉献，她把所有潜在的难民 (纳粹上台后) ——除了赖希——都视为她的问题儿童 *Sorgenkinder*。另一方面，当安娜不扮演照顾者的角色时，人们就会成为她的竞争对手。她对被分析者，尤其是孩子，表现出强烈的占有欲，并倾向于将他们与竞争对手分开。用她自己的话说，她在提到两个伯林厄姆家的子女时说：“我的思想与我的工作一致，但它们在中间没有适当的位置……我有时认为我不仅仅想使他们健康，还同时...希望为我自己所拥有。”然而，尽管有这样的深刻声明，安娜实现了这个愿望，以至于她最终拥有了母亲和四个孩子，成为他们的“替代父母”和分析师。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虚弱的状态下，他跟了这个计划。之后，安娜·弗洛伊德发展出儿童分析技术理论，强调孩子不是成年人，因此分析师也是孩子的教育者，并且事实上比父母做得更好。我确信这种占有欲在她与我母亲的关系中起着很大的作用，我母亲在 1927 年成为她的患者之后一直努力保持在维也纳分析师的“内圈”。

我家庭的遭遇与伯林厄姆家庭的经历有一些相似之处。安娜·弗洛伊德开始同时分析伯林厄姆家的四个孩子，并与他们的母亲发展了亲密友谊。由于罗伯特·伯林厄姆“疯狂”，弗洛伊德夫妇都很努力地远离伯林厄姆父亲，认为孩子与罗伯特有任何牵连都不好。安娜写信给罗伯特，告诉他他从美国来探望孩子的旅行让他们心烦意乱，他应该远离 (2:201-2)。与此同时，安娜试图让孩子们相信和父亲见面对他们不利。安娜还让弗洛伊德分析多萝西，他们一起度假，弗洛伊德、多萝西、她的孩子和安娜。这非常亲密，完全不是当时所要求的中立心理分析技术。当罗伯特仍然来探望他们时，弗洛伊德告诉他，他正在帮助多萝西克服对罗伯特的性需求。孩子们从未克服与父亲分离的冲突。

不幸的是，这个故事与我家庭发生的事情相似。我母亲在 1927 年与安娜·弗洛伊德进行心理分析。安娜告诉她放弃与赖希的性关系，因为他“疯了”。安娜告诉我母亲不要再生第二个孩子，也就是说我。我相信安娜，作为知情者，了解我父母的婚姻斗争，试图影响弗洛伊德反对赖希，就像费德恩一样。我母亲在 1931 年反抗安娜，暂时回到我父亲身边，他们已经分开。我认为安娜从未原谅她的这种不忠，并且我母亲从此之后一直努力保持在维也纳分析师的“内圈”。

我的妹妹，但幸运的是不包括我，被送去接受贝尔塔·伯恩斯坦的分析，她在与安娜弗洛伊德进行督导 (然而，杨-布鲁尔似乎并不这么认为)，没有其他人可以担任督导。我的妹妹告诉我，她的分析仅仅是贝尔塔一遍遍地告诉她她的父亲“疯了”，那就是分析。我记得我妹妹大约二十岁时，我们——我母亲、贝尔塔·伯恩斯坦、我妹妹和我——正在爬山，贝尔塔一直在唠叨：“现在你看到他疯了吧，你难道看出来吗？”最后，我妹妹很生气地向她吐口水。但是继续与伯林厄姆一家类比，贝尔塔·伯恩斯坦写信给我父亲 (1934 年威廉·赖希给安妮·赖希的信，援引伯恩斯坦未发表的信)，在这封信中，她告诉他远离孩子，不要写信或打电话，因为这会干扰伊娃的分析。他作为一个正派、天真而不易受操纵的人，接受了这一点，他甚至说：“我不想干扰分析。”这对我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因为几年里，我的父亲就这样消失在我的生活中，我不知道原因，这个经历也导致了以后的分离。

总之，安娜·弗洛伊德有许多神经质的个人动机促使她摆脱威廉·赖希，与此同时，她的个性使得其他分析师很难对他保持更加平和的态度。考虑到当时的政治环境，这两个人无法避免最终导致赖希被驱逐的冲突。

在麦卡锡主义 (1950) 发动之前的 40 年代，美国政府已经开始无证据地随意歧视和监禁调查人员认为有嫌疑的对象，许多欧洲精神分析学家移民美国后便不得不进入沉默模式而“专心学术”。后期的赖希被主流认为已经进入了伪科学，转向生物能量 (曾与爱因斯坦交流多次)、天气控制^[18]和 UFO 研究，最终被美国 FDA 逮捕入狱^[19]、焚烧销毁他的书籍。此外赖希还受到联邦调查局、移民归化局的迫害。根据遗嘱，赖希实验室被改造为博物馆。

缅因州兰奇利

激进精神病学家威廉·赖克的前实验室。



威廉·赖希作为敌方外国人被捕后的自我审查：非法监禁的寒蝉效应

菲利普·贝内特 

第 341-364 页 | 2013年5月7日接受, 在线发布: 2017年12月31日

引用这篇文章 <https://doi.org/10.1111/1745-8315.12115>



全文

数字和数据

参考

引用

指标

转载和许可

阅读这篇文章

抽象的

在讨论了威廉·赖克 (Wilhelm Reich) 在精神分析领域的地位后, 本文探讨了于 1941 年 12 月作为“敌方外国人”被捕的情况。还探讨了赖克对监禁 (非法监禁, 持续了近一个月) 的情绪反应。许多学者表示, 许多欧洲激进精神分析学家移民到美国后就不再分享他们以前的政治观点。在对这种“沉默”模式进行了简短讨论之后, 有人认为赖希拒绝出版某些文件是由于自我施加的审查制度, 部分原因是担心政府进一步干涉他的生活和工作。然而, 这种恐惧并没有延伸到他对新发展的有机能量理论的讨论中。

相关的研究

推荐文章

人们还阅读了

美国政府对 Wilhelm Reich 博士的迫害

大英百科全书, 2015 年: “从 1956 年到 1960 年, 他的许多著作和设备被 FDA 官员没收和销毁。在 21 世纪, 一些人认为这种大规模销毁是美国历史上最公然的审查例子之一。” [14]

James Strick (科学史学家), 2015 年: “1956 年和 1960 年, 美国政府官员监督公开焚烧奥地利出生的科学家威廉·赖希 (Wilhelm Reich) 的书籍和科学仪器。这是最令人发指的行为之一。正如纽约出版商罗杰·斯特劳斯 (Roger Straus) 在几十年后多次提到的那样, 他解释了为什么他的公司法勒、斯特劳斯和吉鲁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从 1960 年开始坚定地将赖希出版的所有作品重新印刷。” [15]

迈伦·夏拉夫是赖希的弟子, 著有一本重要的传记 (《怒火冲天》 (Fury on Earth) [纽约: 圣马丁出版社, 1983]), 也是陪同赖希前往宾夕法尼亚州路易斯堡联邦监狱的人。在进入监狱时, 赖希给夏拉夫留下了这样一句话 (他将在一年之内死去): 记住, 我仍然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参考

- 1.拉康对此批判道：我们（精神分析者）的业务是欺骗。虚张声势的吹牛,威严令人敬畏,用一些唬人的字眼弄得人们头晕目眩,这仍然是人们通常称之为装腔作势的东西。……我称之为分析中的演说家完全通过暗示来操作。
2. Young-Bruehl E. Anna Freud: a biography. New York: Summit Books, 1988.
3. Burlingham M. The last Tiffany: a biography of Dorothy Tiffany Burlingham. New York: Atheneum, 1989.
4. Fallend K. Wilhelm Reich in Wien: Psychoanalyse und Politik. Wien: Geyer Edition, 1988.
5. Fallend K, Nitzschke B, eds. Der Fall Wilhelm Reich: Beitrage Zum Verha"ltniss von Psychoanalyse und Politik.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Taschenbuch, 1997.
6. Fenichel O. Rundbriefe: (1934–1945). Vol. I, 119 Reichmayr J, Mu"hlleitner E, eds. Frankfurt am Main und Basel: Stroemfeld, 1998.
7. Sharaf M. Fury on earth: A biography of Wilhelm Reich.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3.
8. Sterba R. Erinnerungen eines Wiener Psychoanalytikers. Frankfurt am Main: S Fischer, 1985.
9. Reich W. Character analysis: 3rd ed. New York: Orgone Institute Press; 1949.
10. Steiner R. It is a new kind of diaspora. Int Rev Psychoanal, 1989; 16: 35–72.
11. Jones E. The life and work of Sigmund Freud. Vol. III. New York: Basic Books; 1957.
12. Roazen P. Helene Deutsch: A psychoanalysts life. 2nd ed.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 1992.
13. Sterba R. Character resistance. Psychoanal Q., 1951;20:72–76.
14. Deutsch H. Confrontations with myself: an epilogue. New York: WW Norton & Co., 1973.
15. Bergman M. The historical roots of psychoanalytic orthodoxy. Int J Psychoanal, 1997;78:69–86.
16. Freud S. The complete letters of Sigmund Freud to Wilhelm Fliess: 1887–1904. Masson J, ed.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1985.
17. Heller P. A child analysis with Anna Freud. Madison CT: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1990.
18. 根据每日新闻报道匿名目击者称 1953 年的干旱中赖希云雾发生器成功帮助缅因州的两位农民释放了降雨
19. Jerome Greenfield, Wilhelm Reich vs. the U.S.A

<https://zhuanlan.zhihu.com/p/661662716>